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

NINGJIU CHUANTONG ZHENGZHI DE XIANDAI ZHUANXING — KANGYOUWEI JINDAI ZHONGGUO ZHENGZHI FAZHANGUAN YANJIU

◎ 白锐 著



暨南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书系（第二辑）

■ 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多支柱体系建设

■ 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

■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

■ 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

■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 广东省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 赢在领导——有效领导力提升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

白锐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康有为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发展观。他以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近代中国所必须达成的政治目标,考察了为达成此一系列目标所应当经由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且讨论了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中必然会遭遇的文化建设问题。康有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宗奉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泥古、不唯书的学者,他的政治发展观是一套开放的中西兼具的有关近代中国政治前途的思想体系,此思想体系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达到了时人未及的近代化理论高度。本书一方面梳理康氏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的种种概念体系,一方面企图深入剖析与总结这种政治发展观的内在张力,祈望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动力与阻力,甚至为规划当代中国政治之发展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贺小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白锐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47-192-4

I 寻… II. 白… III. 康有为(1858~1927)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9355号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研究

白锐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29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字 数: 156千字

ISBN 978-7-80247-192-4/D·740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邮箱: 2006HeXiaoXia@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6.75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巍巍华夏，悠悠万世，智者滚滚、高论横流，乘劲帆之快、激一时之浪者，几茫茫如过江之鲫。然而风消云淡、势易时移、大浪淘沙、百转千折后，仍千年一脉、弦歌不辍，成万世之绝响者，何其难矣！又何其伟哉！叹感为学立言之难，大哲如孔圣亦守志曰：述而不作。并嘱“巧言令色鲜矣仁”以戒后学浮浪。然朱子亦云：一世之学即为一时之治！是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成为古往今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不懈追求。

暨南大学作为以“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为己任的百年侨校，秉承“忠信笃敬”之校训，向以忧思苍生、济达天下为念。先后敦请马寅初、郑振铎、王亚南、周谷城、钱钟书、周建人、夏衍、许德珩、胡愈之、严济慈、楚图南等名师执教，培养出吴学谦、李岚清、江上青（新四军烈士、江泽民同志养父）、许敦茂（泰国国会议长）、李光前（新加坡大学校长）、邓垦（邓小平胞弟、湖北省副省长）等公共管理领域的杰出人才，“急公好义、为国为民”是暨南人践行“立人、立言、立行”之“三不朽”的优良传统。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法学院和文学院更为当时公共管理的思想重镇和人才摇篮。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暨大的公共管理学科停办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应时代召唤建系，至今只是刚足十年幼齿的懵懂少年和学术阿童。虽然孔子曾经说过：“吾十岁有五而志于学”。但十岁的暨南公管人却乐于追随先贤、以学为业、不懈

前行!

经过十年拓荒与辛勤耕耘,暨南大学公共管理系已拥有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三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行政管理、企业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三个中文教学本科专业,并在暨南大学国际学院开设了全英语教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一级学科下设置了社会保障管理博士研究方向和保险经济与风险管理博士研究方向。2008年开设的行政管理(应急管理方向),是率先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应急管理的本科专业,已得到众多学者与省部级政府官员的高度认可,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全方位的支持。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系现有专职教师21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9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1人。多数老师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国内名校名所或师从著名学者,多位老师曾到美国杜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海外名校进修或讲学,部分老师曾在省、市、县、乡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任职,近半数老师作为第一作者已在Physica (SCI)、《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哲学研究》、《统计研究》、《民族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财政研究》、《中国工业经济》、《高等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过论文,一批成果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国家统计局等高层次政府奖。全系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行政伦理、知识社会学、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部分研究成果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省部级大内参)、《新华文摘》等转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本着“提掖后学、共襄学术”之

精神，暨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书系”第二辑作为暨大公共管理系的“十年树木”与各位尊敬的读者见面，本专辑共有7本专著。

《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多支柱体系建设》系林毓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保障与政府职能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后续专著。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政治学研究》、《统计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等权威杂志。

《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系董建新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报告，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重要刊物。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康有为近代中国发展观研究》系白锐副教授游学美国一年后的新著，其部分内容已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是张旺副教授师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师大王英杰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该书已累计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是潇洒的成都幺妹胡涤非副教授的用心之作，看不出平时嘻嘻哈哈的她关注的居然是“兹事体大”的政治体制，复旦博士绝不是浪得虚名。

《广东省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是第二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得主洪凯副教授的辛劳之作，其书如人，乡土得那是“相当地可以”。

《赢在领导——有效领导力提升研究》系暨南大学MPA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卢文刚老师总结提炼其长期对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领导干部选拔与测评、深度咨询与系统培训及MPA、MBA、领导学等课程教学科研经验后的心血凝结。部分内容

寻求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

总序

已由广州市政府摄制成视频录像供6万多公务员教育培训学习使用。

如果说十年弱冠的公共管理系只是暨南大学这棵百年老树的幼枝，那么“暨南政治与公共管理书系”第二辑则是这株幼枝上的新发嫩芽。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锐气，却乏行走江湖之厚重。在本辑丛书付印之际，自知浅薄的编委会诸君一如接生室外的准爸爸们一般坐卧不安、惴惴惶惶，急切地等待着各位读者如医生一样的宣判！兴奋、甜蜜、焦躁和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是我们此刻真实的心情。

也许聊以自慰的只有暨南学子汪国真的小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系政治与公共管理书系编委会

2008年9月

中州无外皆同壤
旧命维新岂陋邦

——钱锺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导论	(5)
第一节 一般政治发展观的回顾	(6)
第二节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举要	(21)
一、目标	(22)
二、进程	(26)
第三节 康有为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	(30)
第二章 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的形成背景和理论 基础	(38)
第一节 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形成背景	(38)
一、康有为所处时代背景略述	(39)
二、康有为的个人生活背景	(42)
第二节 “仁”：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思想文化基础	(47)
一、对儒学的宗奉与发扬	(48)
二、“仁”对于康有为政治发展观形成的意义	(51)
三、“仁”的理念同西学成份的调和	(57)
第三章 政治发展的双重目标	(65)
第一节 大同世界：发展的上层目标	(65)
一、大同世界的政治结构体系	(67)
二、大同世界的社会形态	(74)
第二节 发达的近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下层目标	(83)
一、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83)
二、主权	(87)

三、宪政及合法性问题	(92)
四、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能力	(97)
第四章 政治渐进发展及其途径	(103)
第一节 渐进式政治发展途径的缘起	(104)
一、对“三世说”的阐释	(104)
二、中国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的原因	(106)
三、一种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方法	(112)
第二节 君主立宪制的建议	(117)
一、君主立宪制的过渡性	(117)
二、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制度因素	(120)
第五章 政治文化近代化问题	(137)
第一节 本土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性的调适问题	(138)
第二节 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	(145)
第六章 康有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检讨	(154)
第一节 对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评价	(155)
一、近代性	(155)
二、合理性	(157)
三、局限性	(160)
第二节 对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167)
一、传统型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168)
二、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172)
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四个组织化指标	(176)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202)

引言

近代中国政治的改革，始于“戊戌变法”。这场改革运动以及推动它的改革思维，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首“戊戌变法”的各个历史时期，康有为的巨大影响力毋庸置疑。一直以来，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对“戊戌变法”的决定性作用，康氏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注释、解读与诤难，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以及国外汉学界自始至今的热门课题。从康有为的门人梁启超开始，一直到现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不同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康有为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宪政思想乃至其文学作品、书法艺术等，所及之处，无微弗届；并且，可以相信，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有关康有为研究的作品问世。研究康有为的著作与成果浩如烟海，似乎再进行类似研究，几乎无新意可言——读者会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还要选择本项研究作为努力的方向呢？

答案是，康有为对政治现代化进行过深入的思索，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应对政治发展中种种问题的对策，而这些，正是目前我们的社会所必须了解的。因此，从一名政治学者的角度看，对康有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发展的政治观，尤其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观的研究，还有可以继续加以深入挖掘的余地。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研究，或者对康有为政治思想中某一层面的研究，虽然国内外的相关成果真可谓汗牛充

栋，但是细加辨析，则会发现这些成果主要都是来自史学、哲学甚至文学方面的努力，学科立场既已不同，学术旨趣自然相去甚远；在政治学者所作的研究当中，最大多数的是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不能不涉及的康有为思想历史地位的综合性介绍，就其方法论与立足点而言，仍然是同传统的思想研究不便区分，而难见其新颖独到之处的。海峡两岸都曾有过关于康有为的多种传记与评传，对康氏思想偶有旁及，而专门的思想研究著作有十数种传世。在大陆学术界，以李泽厚于20世纪50年代所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影响较大，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较早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过数种有关康有为的思想研究论著，或者有关康有为思想中某一方面——如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专门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邝柏林著《康有为哲学思想》，汤志钧著《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马洪林著《康有为大传》与《康有为评传》，臧世俊著《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等。政治学者对康有为生平与思想的专门研究，最为突出的是萧公权先生集二十年之功所成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从康有为的生平到他的政治理想、行政改制乃至哲学思想都作了深入全面的剖析，是一部全景式的康有为研究著作，在康氏思想的政治学研究中自成大家之言。

但我自从学习作为政治思想史中专门问题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介绍，到研读康有为生平与著作，乃至萌生出以所学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知识来剖析康有为思想，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传记式研究虽然必要，但却总是免不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而于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深度工作无补；同时也越来越坚信，由于康有为政治思想所体现出来的实质，乃是以近代中国政治发展

为指向的进步与发展式政治思维，而这样的政治思维在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鲜见，因此，对于康有为政治思想的研究工作，尤其需要改变我们研究的角度，以其政治发展观作为切入点，剖析康有为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未来发展逻辑的思索中的得与失。罗荣渠先生曾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认为：“一百年前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胡适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曾指出这一点：‘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①

与现代化理论密不可分的政治发展研究对此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我在稍后的篇幅中会论述政治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的同—性）。有鉴于此，从政治发展思想的角度对康有为政治思想加以深入的挖掘与整理，是值得用力的研究课题。我期望以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将发展的范式运用于自己的近代中国政治研究工作，或者更进一步，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探究近现代中国政治的变迁。政治发展的研究，正如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的，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政治学界，其研究的旨趣在于，以某种现代化的标准剖析传统社会（也有人称为“前现代社会”）在经历社会转型时的政治变迁过程。正是政治发展研究的这一性质，与康有为政治思想中的实质内容相切合，成为分析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极为有用的理论工具；并且，在政治学界的相关政治发展研究中，个案研究构成了相当重要的部分，以中国学者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及当时的中国学者为政治发展研究准备了十分充分的材料，如果能够将政治发展的理论运用于对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的深度剖析，亦不失为政治发展理论在一个重要的转型社会个案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研究中的重要拓展。

因此，本项研究在方法论问题上也试图作类似的突破。显而易见，在方法论上，本项研究并不只是简单地对康有为政治发展观作历史性的描述，我所希望者，是将正式的政治学理论与分析工具同政治历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首先，对康有为政治发展观作一个纵向的分析是必要的，即将康有为政治发展观中所涉及的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途径等因素，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背景下作一个历史性的考察，全面地掌握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线索；仅仅作这样的工作显然是不够的，本项研究还将由政治发展的角度，通过所提炼的政治发展要素相关理念来考察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种种方面，促使这项工作可以进行横向的剖析。这项研究工作必须努力避免将一种成形的理论模式生硬地套在所要分析的对象上。鉴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多样性和繁杂性，这一点尤其不易。应当作的第一项工作，即是简要分析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的诸方面，汲取并综合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相关理念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导论

大凡提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都是以西方在东方的扩张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正式政治制度的冲击——鸦片战争作为明确的起点，诚然，从某种中西沟通的角度而言，此种对历史的认识方法自有其道理，但是从中国自身的社会与政治发展逻辑而言，真正使整个中国社会步入所谓“近代”的思想与文化气氛，从而使中国政治历史步入近代化轨迹的，是 19 世纪末的一系列由甲午战争引发的思想激荡和政治变革，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终以“戊戌变法”作为其戏剧性的高潮。考察 20 世纪的中国政治，不能不回溯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那次政治改革运动。从世界政治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一系列政治事件标示着近代世界的发展逻辑终于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深入进行，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现出来，此一发展正是以国家结构、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变迁为核心要件的。毫无疑问，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活动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力。故此，本研究主要集中于“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方面的思想，也就是他针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建构、政治文化塑造以及政治制度设计等方面而形成的思路。通过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和对历史的深入思索可以发现，康有为极为庞大博杂的政治思想中，针对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而作的理论探索构成了其核心的部分。透过康有为政治发展观，我们也能够看到，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思维中普遍呈现出

的强烈的发展指向，在康有为那里第一次相当系统地以极具近现代色彩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图景中。

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理论依据作一点相关的阐释。

第一节 一般政治发展观的回顾

本研究是针对“康有为政治发展观”所进行的，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将一个较为现代化的政治学术语运用于对一位晚清人物的思想分析，是否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呢？因为有人不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进行政治分析的一个术语与康有为等晚清时期的思想家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呢？具体而言，政治发展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种理论产生之前数十年的政治现实与政治思想吗？大家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政治发展理论乃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这个方面的研究在 60 年代渐成气候，并于 70 年代蔚成大观。但是显然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是，政治发展与变迁原本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真相，而对这一现象的理性总结，即政治发展观念与政治发展思想，也是早在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之前一两百年的时代以前就已经渐显端倪了。并且，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意义上深究其渊源，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

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过程。事物的发展与变迁，是事物存在的一般状态。事物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对这一现象，古代中外的先贤早已有了入微的观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对自然事物与人类社会发展、式微、再发展这一辩

证进程的洗练表述；古希腊哲学家曾经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的智者注意到，世间万物同逝者如斯的流水一样，处在永恒的变动与消长当中。赫拉克里特属于古希腊哲学家中思想最为深刻的，他已经从辩证法的角度揭示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大量的具体观察中得出了“万物皆流”的深刻结论。但是，论事物的变化与论事物的发展，仍然有其深刻的不同之处。论事物的变化，还仅仅是对于宇宙与人类自身的客观认识，还无法将人的意志作用于对象、实现于对象；而讲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在探求事物内在演变规律，是以一种进步的心态来反观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并且进而试图将人自身的理性能力运用于对象身上。以发展的眼光看事物，正是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得以加强以后在认识能力上的反映，而这是近代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因此古代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虽然可以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里程碑式的话语，但是只有近代英国的培根才能发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人类理性宣言。我们不妨这样说，只有近代科学与文明，才赋予人们理性主义与进步主义的认识方法，也只有近代文明所培育的理性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头脑，才可能洞察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及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的进程，并且才可能努力地探索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以进步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也就成为近代以来学术与思想界的自然而然的趋势。就政治发展本身而言，任何历史阶段的政治共同体都可能存在政治发展，亨廷顿曾经在一个地方暗示，即使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也有其政治